

李今庸讲中医经典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 组织编写

名中医讲学荟萃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科学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名中医讲学荟萃

李今庸讲中医经典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 组织编写

李今庸 著

刘艳骄 校阅

周立美 吕学玉 李莎莎 郎 明 整理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名中医讲学荟萃》

录音整理小组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 峥	王 乐	吕学玉	朱 玲
刘春生	刘艳骄	李枋菲	李玲孺
李莎莎	李 鹏	张 楠	周立美
郎 明	胡春宇	徐 慧	黄艳影

总 前 言

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前身)成立之初,岳美中、方药中先生广邀国内一流中医药名家前来授课。授课内容从中医的整体观、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经络研究、辨证论治到经典学习、文献研究及各科疑难病诊治等方面,使学员们强化了基础理论、拓宽了临证思路。这是中医界首个百家讲坛,更是一段不可复制的盛况。讲坛上留下的名字有:赵锡武、姜春华、周金黄、裘沛然、任应秋、祝谌予、耿鉴庭、邓铁涛、刘渡舟、万友生、董建华、凌耀星、俞长荣、金寿山、黄星垣、余桂清、程莘农、张琪、王绵之、王雪苔、李今庸、马继兴、侯灿、匡调元、陈泽霖、郭子光、孟庆云、王琦、张德二、于天星等。

时光荏苒、青丝难再。为了重现讲坛的风采,惠及更多的中医药学人,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将当年的讲课录音进行逐一还原、分类、整理、编辑,最终形成此套《名中医讲学荟萃》丛书。

本丛书源自当年的讲课录音,极力保留了名家的授课思路和语言风格,读之有亲临课堂之感。本丛书的面世,对中医理论与临床研究必将有积极推动作用,同时也为中医药研究生教学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参考资料。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2年6月

前 言

李今庸先生是湖北中医药大学教授,在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成立初期,应岳美中、方药中先生的邀请,多次到研究生部为研究生授课,其讲课的内容涉及《黄帝内经》、《金匱要略》,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和尊重,其教授方式大多数是专题讲座,没有留下具体的讲稿,好在当时的研究生部曾经留心于名老专家的讲课,并令当时的电化教学室的郎明老师将这些内容进行录音,保存。这一存就是三十年,尽管研究生部几度搬迁,甚至处于风雨飘摇之际,研究生部的老师们都没有舍得丢弃这些录音资料,直到2005年研究生院成立,我作为教育管理处的负责人发现这些资料后,一直很想将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可是没有经费,仍然束之高阁。2008年,胡春宇老师和我一起争取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自选课题,才有机会利用此项经费,将这些即将无法复制的资料制作成MP3形式的录音光盘,并逐渐整理、校对、编辑成一本《李今庸讲中医经典》一书,作为研究生教学的辅助教学资料,并得到科学出版社的曹丽英博士的赏识,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领导的支持下得以出版,我认为这是有利于中医研究生教学的一份重要参考资料,同时,也是对已经出版的李今庸先生讲课录音资料的重要补充。

本讲座涉及的内容主要是《黄帝内经》部分,内容包括:《黄帝内经》中的相关概念讲解、一些名词的解释等,比较全面的是《金匱要略》的几篇重要讲解内容,如《金匱要略》全书的基本内容及如何学习肺痿肺痛咳嗽上气、痰饮咳嗽病篇、血痹虚劳篇、惊悸吐衄下血胸闷瘀血病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很值得阅读的。

在整理录音资料的过程中,我院的几位同道针对录音资料的不完整性,结合李今庸先生以前发表的一些论文,再次查阅了中医经典著作《黄

帝内经》注评,结合其他前辈专家对《黄帝内经》注释资料,进行了一年多的整理工作,现在终于使其成书,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次重要的学习机会,也加深了我们对《黄帝内经》的理解。特别是李今庸先生关于《金匱要略》几篇的讲解,更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金匱要略》中几篇关于内科杂病的理解,从而也对我们提高临床疗效有所帮助。

中医学术源远流长,需要一代代人一代人的注释和解读,通过对经典著作的名家解读,有助于我们对研究生中医经典著作的教学,回想起刚到研究生院的首次教学任务就是《金匱要略》的讲座,可以说费尽心血,每讲一次都要付出10天左右的备课时间,才能登台教学,现在通过整理李今庸先生讲课内容,对于进一步理解《金匱要略》的内涵还是很有帮助的,就连帮助我整理的研究生也感收获颇丰。

师古而不泥古,继承不忘创新。古人的智慧需要吸取,今天的新疾病也需要探索,理论的发展是在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只有读懂了古人的智慧,才能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临床实践中有所发展、有所发现、有所前进。这也是我等整理李今庸先生讲课录音资料的点滴体会,让历史告诉未来,今天的中医一定能把古人的精华发扬光大。

衷心感谢诸位研究生同学对整理本书做了大量的工作,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自主选题项目经费的支持,感谢科学出版社编辑同志对此项工作的支持!

刘艳骄
2012年仲春于北京

李今庸先生简介

李今庸(1925—),男,湖北中医学药大学教授、中医学家、全国第一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幼承家业,在家乡行医。1957年春,至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任教。1959年2月转为湖北中医学院继续任教。现兼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长春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全国李时珍研究会名誉主委,湖北省中医药学会理事长、湖北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等职。1991年后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先生知识广博,中医药学理论根基深厚,通晓中医内、外、妇、儿各科,善于将中医学理论用于临床实践,在辨证施治原则指导下治疗各科疾病,尤其长于治疗内科及妇科疑难重证,如咳喘、臌胀、水肿、血证、结石、中风偏瘫、癲狂以及月经不调、白带、崩漏、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等。先后讲授过《金匱要略》、《黄帝内经》、《难经》以及《中医基础学》等。

撰著有《读医心得》、《读古医书随笔》、《金匱要略讲解》、《李今庸临床经验辑要》、《古医书研究》、《舌耕余话》;主编《新编黄帝内经纲目》、《金匱要略讲义》、《湖北医学史稿》、《中医学辨证法简论》、《奇治外用方》、《内经选读》、《黄帝内经索引》等;论文有《论黄帝内经的营卫理论》、《论“穴位”在人身中的重要意义》、《楚医学对祖国医学的重大贡献》、《我国古代对“脑”的认识》、《中医药学应以东方文化的面貌走向现代化》、《再论我国中西医结合的成败》、《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考》、《咳喘论治》、《二陈汤的临床运用》等数十篇。

先生不仅精通中医,而且对现代医学也有一定的了解,在临床实践中,牢牢掌握辨证施治是中医的一大特色,是区别其他医学的本质所在。

辨证施治不仅丰富了中医理论,也是中医临证时的一种思维方式。

先生临床方小量轻,慎用贵药。《素问·至真要大论》说:“方有大小。”何谓大方?何谓小方?一则以药味多寡别大小,一方中药味多为大方,药味少为小方;二则以药量轻重别大小,一方中药味尽管很少,但药量大,也可算大方,而药味少,药量轻即为小方。“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李教授曾在一首联语中写到:“方不在大,对证则效;药不在贵,中病即灵。”所以他临证处方用药常遵循自己制定的一项基本原则:“选方用药即达到治疗目的,又不浪费药材。”他的每张处方一般8~9味药,最多不超过12味;每味药的用量多在10g左右。组方法度严谨,轻灵活泼,补而不滞,行而不散。

先生善于用中医药治疗疑难病证,使很多患者得到有效的治疗,享誉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中医的楷模。

目 录

总前言	
前言	
李今庸先生简介	

上篇 《黄帝内经》若干问题讲解

第一章 《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和成书地点考	(3)
第二章 读《黄帝内经》札记(一)	(10)
第三章 读《黄帝内经》札记(二)	(14)
第四章 读《黄帝内经》札记(三)	(18)
第五章 读《黄帝内经》札记(四)	(22)
第六章 读《黄帝内经》札记(五)	(25)
第七章 读《黄帝内经》札记(六)	(29)
第八章 读《黄帝内经》札记(七)	(33)
第九章 读《黄帝内经》札记(八)	(38)
第十章 读《黄帝内经》札记(九)	(42)
第十一章 读《黄帝内经》札记(十)	(46)
第十二章 读《黄帝内经》札记(十一)	(50)
第十三章 读《黄帝内经》札记(十二)	(55)
第十四章 读《黄帝内经》札记(十三)	(59)
第十五章 读《黄帝内经》札记(十四)	(62)

中篇 《金匱要略》若干问题讲解

第一章 《金匱要略》全书的基本内容及如何学习	(69)
第二章 肺痿肺癰咳嗽上气	(77)
第三章 痰饮咳嗽病篇	(82)
第四章 血痹虚劳篇	(89)
第五章 惊悸吐衄下血胸悶瘀血病脉证并治	(95)

下篇 藏象学说若干问题讲解

第一章 藏象学说的内容及其产生的客观基础	(103)
第二章 精、神、气、血、津液等的内在联系	(110)
第三章 藏象学说是辨证施治的理论基础	(119)

上篇

《黄帝内经》若干问题讲解



第一章 《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和成书地点考

《黄帝内经》一书,一般学者认为它包括现在流传的《素问》和《灵枢》两部书在内,为了弄清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背景,弄清我国古代医学史的发展情况,有必要对《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及成书地点加以稽考。以前,人们总是说《黄帝内经》的成书,不是出于一人一时之手,这种笼统的说法,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诚然,现存《黄帝内经》的内容,不是一个时间的产物,如《灵枢·阴阳系日月》、《素问·脉解》等就是西汉太初以后的作品,所谓《素问》“运气七篇”的《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等就是东汉建武以后的作品,但在这些内容还未补上去以前,我认为《黄帝内经》已经是以一部《黄帝内经》的形式而存在,它一出世就具备了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形式,并不是补充上去了这些内容才成书的,也不是各个不同时代的各个医学小册子被人一天把它合在一起成书的,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内容来考证它的成书年代和成书地点。

《黄帝内经》成书的确凿年代现在是无法考证的。然我们从大量的古代文献中仍然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查出它成书的大致时间来,《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大约在战国后期,成书地点可能在秦国。下面我们就来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

一、《黄帝内经》成书的时间上限

(1)《素问·著至教论》说:“足以治群僚,不足至(治)侯王”,《素问·疏五过论》说“封君败伤,及欲侯王”二考“侯王”一词,亦见于《老子》第三十二章和第三十七章,当是战国期间诸侯王出现以后的事情。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说过:“此书(指《素问》)有‘失侯失王’,之语。”秦灭六国,汉诸王国除,始有失侯王者。

(2)《素问·疏五过论》中论述了“脱营”和“失精”之证,记载了“封君败伤”,“暴乐暴苦,始乐后苦”,“故贵脱势”,“始富后贫”等,这是社会急剧变革

的一种反映,当和上面“失侯王”之事紧密相连在一起。正因为“失侯王”,“封君败伤”,“故贵脱势”一部分人在经济上就“始富”而“后贫”,因而导致情志上的“始乐”而“后苦”。由于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的急剧降落,情志久久怫郁,从而发生“脱营”、“失精”之证。“脱营”、“失精”之证被总结出来而反映在《黄帝内经》里,表明当时不少人患此病证,也说明这是社会急剧变革的产物。

(3)《素问·上古天真论》记载当时的许多人都是“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以致其年,半百而衰”,这正是社会变革时期没落阶级悲观失望以享乐自慰的一种思想反映。《史记·魏公子列传》所载:信陵君魏公子无忌“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人,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就是其例。

(4)《灵枢·九针十二原》说:“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这里以一个国王的语气而讲到“收其租税”。显然是新兴地主阶级取得了政权在全国推行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后才有的事。

(5)《黄帝内经》中使用了“将军”一词,《素问·灵兰秘典论》说:“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考“将军”之词,始于战国,《史记·司马穰宜列传》司马贞索引说:“……遂以‘将军’为官名。故《尸子》曰:‘十万之师,无将军则乱’,六国时有其官。”

(6)《黄帝内经》认为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是“精”。如《素问·金匱真言论》说:“夫精者,身之本也”。《灵枢·经脉》说:“人始生,先成精”。《灵枢·决气》说:“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在人的生命活动过程中,若精气充足和畅流,就轻劲多力,反之,精气消绝,就要失去生命活动而死亡。然古代“精气学说”是齐国翟下学官的宋研、尹文学派倡导的,他们认为:“凡物之精,比(原作‘此’误,今改)则为生,下生五谷,仁为列星……”(见《管子·内业》。据《十批判书》谓此篇乃宋、尹学派作品),提出了具有流动性质的细微物质的精气,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根本要素。《中国历代哲学文选·先秦篇》认为这一派的唯物主义学说,和当时医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联系。

(7)《灵枢·玉版》记载: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余闻之则为不仁,然愿闻其道,弗行于人。这里“不仁”一词的含义,和后面《灵枢·刺节真邪》中“卫气不行,则为不仁”,《素问·痹论》中“皮肤不营,故为不仁”的“肌肤不知寒热痛痒”的“不仁”一词是不同的,这是一种“仁术”思想的反映。这种所谓“仁术”思想,是我国战国时期孟轲倡导的。孟轲在《孟子·梁惠王上》说过:“……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庖厨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这表明了《黄帝内经》受到孟轲“仁术”思想的影响。

(8) 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它们是我国古代的两个不同的哲学派别。根据《史记》中“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和“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介”的记载,说明是齐国稷下学宫的邹衍才把二者合为一家的。然在《黄帝内经》里,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普遍是被合用的,并且阴阳五行还和精气学说连在一起使用而合成了一家。

(9) 《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说:“邪气之中人也高”(原作‘高也’,误,今据《太素·邪中》文改),《灵枢·官能》说:“邪气之中人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微。”《灵枢·大惑论》说:“卫气之留于阳也久”等等,皆为战国后期的文句,观《墨子研究论文集·墨子要略·墨辨》所载“《经说》上下篇,墨子后学所作。”作者时代,以篇中文句学说考之,似在墨子后百有余年。《经说》下篇“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句,为“之”字倒装句,与《大取篇》“指之人也与首之人也异”句法同,而“《大取》一篇……若以其论辨入微足之,咸在《经说》作者之后也。”等文,可以借证。

上述第一、二、三、四等点,说明了《黄帝内经》的成书,正当我国古代社会发生急剧变革,且新兴地主阶级掌握了政权在其国内全面推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时候。考我国古代奴隶制全面崩溃,新兴的封建制度蓬勃兴起的时候,正是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而上述第五点中,谈到了《黄帝内经》中“将军”一词的出现,也说明了《黄帝内经》之书是在战国时代写成的。战国时代的上限没有固定的标准,我们现在姑以公元前 476 年(春秋时代的结束)为起点,下迄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 221 年)止,共计为 255 年,如果我们机械地把年数分为前、中、后三期,则每期为 85 年,《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哪一期,上述第六点谈到《黄帝内经》与宋、尹学派的关系,第七点谈到《黄帝内经》与孟轲‘仁术思想’的关系,第八点谈到《黄帝内经》与邹衍思想的关系。考宋、尹学派的宋研稍年长于孟轲,尹义稍晚于孟轲,而孟轲出生于公元前 372 或 371 年,在公元前 329 至 324 年之间在齐国首都临淄见齐宣王时始倡导这神所谓“仁术”。上述第七点谈到《黄帝内经》中有“仁术思想”的反映,它的成书当然就只会在孟轲倡导所谓“仁术”之后的时间了。上述第八点谈到《黄帝内经》与邹衍思想的关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邹衍“后孟子”,《盐铁论·论儒》载邹衍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他还在公元前 293 至前 251 年之间到赵国见过平原君,并与平原君门客公孙龙进行过辩论,《黄帝内经》中阴阳五行合用,这就只能在邹衍创立“五德终始论”,曰:“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之后的时间里,根据上述第九点所谈《黄帝内经》一书中的某些文句,则《黄帝内经》的成书当在战国后期,从而表明了《黄帝内经》成书年代的时间上限,是在战国后期而不会更早。

二、《黄帝内经》成书的时间下限

(1)《黄帝内经》中的许多篇章,如《素问·藏气法时论》、《灵枢·病传》等篇记时均用“夜半”、“平旦”、“日出”、“日中”、“日昃”、“下晡”、“早晡”、“日西”、“大晨”、“蚤食”、“晏食定”、“黄昏”、“鸡鸣”等等,“口灾”、“卯”、“辰”、“申”、“酉”、“戌”。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曰:“其中言黔首又言藏气法时,曰夜中,曰平旦,曰中出,曰日中,曰日昃,不言十二支(古不以地支名时)”并以此认为《素问》一书“当是秦人作”。

(2)《黄帝内经》一书中,有几篇都提到“万民”,一词,如《素问·疏五过论》说“为万民式”、“为万民副”,《灵枢·营卫生会》说:“万民皆卧”,《灵枢·岁露论》说:“万民懈惰而皆中于虚风,故万民多病”等。然东汉年间的郑玄,在注释《孝经·天子章》和《礼记·内则》中均谓:“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据此,则《黄帝内经》成书当在秦灭六国之前。虽然“万民”一词后来也沿用,但从《灵枢·九针十二原》所载“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之文,把“万民”和“百姓”对举。《灵枢·师传》说:“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把“百姓”和“人民”对举,这就不会是后来的事情。考《尚书·尧典》说:“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孔氏传:“百姓,百官”。《国语·周语》说:“以备百姓兆民之用”,韦昭注:“百姓,百官有世功者。”。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二篇第一章第二节中说:“庶民和百姓,在当时是有分别的,百姓是贵族,又作‘君子’”。这里“百姓”一词与“万民”一词对举,与“人民”一词对举,它就不是指的一般所谓“普通老百姓”的“百姓”,而是指的“百官”,批的“贵族”。这当然就是较早的了。

(3)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砭石疗法是针刺疗法的前身,针刺疗法是砭石疗法的发展。我国古代,由于铁的发展和利用,冶铁技术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九针被创造出来了,从而促进了我国古代这一疗法的飞速发展。九针的制作实较砭石为精细,且其形制有九种,使用方便,治疗广泛,疗效较高,具有砭石疗法所不可能具有的一些优点,因而它将完全替代砭石疗法就是必然的了。到了秦汉,砭石疗法已基本被淘汰,其《难经·二十八难》所谓“砭射之也”,只是这种疗法残剩的遗迹,然而在《黄帝内经》一书里,砭石疗法和针刺疗法却还是同时被利用的。如《素问·异法方宜论》说:“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灵枢·玉版》说:“故其已

成脓血者,其唯砭石、铍针之所取也。”《素问·示从容论》说:“当投毒药、刺、灸、砭石、汤液”等等。这就表明了《黄帝内经》是在秦汉以前成书的。

(4)《灵枢·师传》说:“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二便”。在一个国家里,是不存在“入国”、“不入国”的问题的,这说明在当时必然是有多个国家的存在,而不会是统一的一个国家。这种情况,就只能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前。《孝经·孝治章》说:“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治家者,不敢失其臣妾之心而况于妻子乎?”。郑玄注:“治国者,诸侯也;治家,谓卿大夫。”《周礼·秋官司寇·罪隶》说:“凡封国若家,中助为牵傍”。郑司农注:“凡封国若家,谓建诸侯,立大夫家也。”《孟子·离娄上》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赵岐注:“……国,谓诸侯之国,家,谓卿大夫之家。”孙爽疏:“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因而说明了这里所谓的“国”,是指“诸侯之国”,所谓的“家”,是指“卿大夫之家”,而不是指现在一般概念的国家。根据以上四点,《黄帝内经》成书年代的时间下限,当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前,也就是说成书于战国后期。

三、《黄帝内经》的成书地点

探讨《黄帝内经》的成书地点,首先需要寻找《黄帝内经》的内容与战国时代的一些国家联系的线索。

(1)《灵枢·本神》说:“实则喘喝,胸盈仰息”。盈,原作“凭”,后人改作“盈”。《甲乙经》卷一第一、《太素》卷六首篇、《咏经》卷六第七、《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七第一及王冰《素问·调经论》注引《针经》文均作“凭”,可证“凭”乃楚地方言,《楚辞补注》离骚经说:“凭不队乎求索”一本作“冯不厌乎求索”,王逸注说:“凭,满也,楚人名满曰凭”,马茂元注说:“冯,古音旁,满也。作副词用,楚地方言,一本作‘凭’。”扬雄《方言》卷二说:“冯,怒也,楚曰冯”。怒亦有胸中愤懣之义,故扬雄说“楚人谓怒曰冯”,是“凭”乃“楚地之方言”也。

(2)《素问·五藏别论》说:“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脏,或以肠胃为脏,或以为腑……”这里提到了“方士二方士者流,是奏秦皇而求‘不死之药’产生于燕、齐一带。

(3)《素问·宝命全形论》说:黔首共饮(饮,原误为余,今据《太素·知针石》改)食二据《史记·六国年表》载,秦用法令命民曰“黔首”,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的第二年,即始皇二十七年。然所谓“岁在沼滩”的秦始皇八年时成书的《吕氏春秋》,已多次使用了“黔首”一词,如《仲夏纪·大乐》说:“故能以一听政者,一说黔首”,《孟秋纪·振乱》说:“黔首无所告想”,《孝行览·慎人》